

行走中国丛书
主编◎张昌山 耿昇

原始之镜

——怒江大峡谷笔记

王坤红◎著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总 序

张昌山

从黑格尔以来，传统中国长期被欧洲中心主义者视为一个“停滞的帝国”。这一观念出现几十年之后，国人终于认识到，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说：“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光绪元年（1875年），李氏又在《因台湾事变筹画海防折》中说：“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数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对世界和中国的这种认识还在多个场合说过。当时的中国，一下子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下，迅速跌进五大洋、四大洲之中的世界，甚至只是亚洲东部一个落后的大国。

这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就是以工业革命为主导的近代化及现代化，而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这一近代化及现代化过程，至今仍在进行之中。

百年间，一些中外人士行走在中国这片古老而又在变动的土地上。行走者中，既有外国的传教士、外交官、探险家，更有中国的文人、学者、科学家、商人、军人，甚至有家庭妇女。他们的游记、札记、考察报告、探险实录等，见证并记录了其自身行走的经历和中国近代化及现代化的过程。当时写下这些文字的人虽身份各异、目的不同，但每一部作品记录的都是作者个人的观察与体验，也记载了他们的所思所想和个性特征。

而不同的作品拼合起来，则在横向空间上似画卷一般展现了中国各地的风土人情和社会面貌，而在纵向的时间上则有如电影一样显示了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变迁的细节与大势。在他们笔下，中国不再是故纸堆中的陈旧记忆，而是活生生展开的现实景象。

把历史还原到现场和实际生活，这大概是每一个想了解历史的人的最大愿望。我们从这些作者在中国的行走、体验之中看到了一种活态的中国历史，它们明显区别于以往的正史和官方档案之类的文献资料所记录的静态中国历史，而且，人生的丰富性、视角的差异性及社会的多元性，也尽在其中了。

德国学者赫尔德所倡导的“同情之理解”，作为一种历史研究方法，在中国学者中以陈寅恪等用得最深也最好。如今，我们把这些中外作者的各类作品作为历史文本来阅读、感受和研究，通过这些文本去体验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的行走、见闻与思考，这也是一种“同情之理解”的实践。今天的人们可以从中感受这些作者所体验的中国社会，从而更具体、更深刻地观察了解中国近代化及现代化进程的艰辛与经验。

将中国放在整个世界大格局中来看，这一百多年的历史，大致就是摇摇晃晃、步履蹒跚地走向世界和走向现代的过程。鉴往才能识今和知来，但由于过去的观念、方法、习惯和经验等因素，有意无意地遮蔽和塑造了我们对于这段历史的认识与解释，因此，云南人民出版社推出的这套“行走中国”大型丛书，是在回头观看百年中国之动静，是在体会“我看人看我”的经验，其实质则是向前进，走向永恒的未来。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史的洪流和时代的浪潮虽然可能会被拖延，却不可能永远被遮挡。司马相如曾说：“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李鸿章有言：“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这两句话的时间相差 2000 年，表达的却是同一种心声，谨抄录于此，作为我们对国家和时代的期许。

是为序。

2015 年 5 月



目 录

总序 / 张昌山 1

开篇 / 1

第一章 傈僳族如是说 / 23

一、以动物、植物为姓氏的民族 / 24

二、迁徙路上的守望者 / 30

三、徘徊于阴阳两界的“神判”王国 / 45

四、日常生活档案 / 66

五、服饰 / 71

六、两性方式 / 73

第二章 独龙族的世界 / 84

一、背景 / 86

二、乌托邦式的家庭公社 / 96

三、婚姻方式 / 107

四、人一鬼一神之间 / 113

五、原始记事 / 128

第三章 峡谷的土著民族——怒族 / 132

一、根的传记 / 132



二、丙中洛——神灵崇拜的乡野 / 140

三、一个土著社会的生活风格 / 155

第四章 家园中的神 / 163

一、自然崇拜 / 166

二、本主崇拜 / 167

三、佛教 / 168

四、道教 / 168

第五章 西风吹过 / 179

一、十字架的背影 / 181

二、在宗教与世俗之间 / 185

三、在十字架的两面 / 197

四、贡山的天主教 / 224



开 篇

在 20 世纪末，人类在物理研究、生物研究的领域里完成了由分子结构向量子结构和基因结构转变的革命，人们梦想的科学神话似乎同时打开了通向天堂和地狱的大门。然而，在即将进入这两道门槛的时候，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人们都在审视将要得到的或将要失去的——是找回曾经丢失的草帽？还是在全球化进程的风暴中变为一粒飘荡的尘埃——这正是从当今的文化思潮传来的多声部回声。我想，不管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一个民族群体，其存在的意义就是在这众多的声音中如何坚守住自己的立场。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在天堂或是地狱的大门前迷失。

——作者的话



早在1926年，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探险队的约瑟夫·洛克一行人就曾对中国的长江、湄公河和怒江进行过考察，他在考察结束后在一篇名为《神奇的原始山谷》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在这几条河流中，萨尔温江（怒江）鲜为人知，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能比中国云南西北部更美呢，这些河流不仅将高原变成了巨大的山脉，而且制造了阴影森森的深谷和无人能进的幽谷……在这个峡谷中，有的路仅有一掌之宽，有的地方只搭着两根木头充当路，走到这儿时，人必须将脚紧紧地贴着悬崖峭壁，用手紧抓住上方的石壁，总之，就像是侧着身子爬行的甲壳类动物那样，但那些怒族人负着沉重的担子仿佛轻而易举就能过去。云南的另一原始部落傈僳族就在这一地区，就像怒族一样，傈僳族也是优秀的猎人，小小的男孩都挎着弓与箭，手上还提着各式各样的猎物，他们是一群温和的丛林人……在我们经过的路上，铁杉下面主要是些藤丛，地表上覆盖着厚厚的苔藓，起伏的路就像蓝白相间的海洋，还有龙胆和火绒草都开得十分鲜艳。在铁杉林的外围是一片片杜鹃，这儿确实是花的海洋，各种花争奇斗艳，空气爽人心脾，阳光明亮辉煌，鸟儿欢歌乱舞，整个世界焕发出勃勃生机，万物都享受着愉悦的生命。视野所及之处是从北到南绵延无尽的山脉，而就在我们脚下分散的鹿丁村（怒江丙中洛一带）如同笼罩在一片晨雾之中……我们的四周都是雄伟之景，奇特宏伟的山脉、古怪神秘而不为人知的深渊、奔腾的大河，以及住在峡谷山岭中的神秘部落，这一切组成难以抵挡的诱惑……”

我不知道这个美国探险队是不是第一例进入怒江的外国人，但是约瑟夫·洛克的文章却带给人们一种对东方梦境的发现与神往。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滇西北横断山脉纵谷地带。由于特殊的地理构造，这里的气候、生物等自然环境形成了明显的垂直分布规律，它跨越了南亚热带、中亚热带、北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寒温带、



高山苔原带七个气候带，被称之为世界第二大峡谷。它因其山高谷深、地势复杂，历经地质史上的重大变故而成为众多生物的避难所，这里珍藏着罕见的多种植物，著名的高黎贡山北段山脉垂直的高度可达 5128 米，它的一面山坡如同一个大的循环，囊括了七个气候带的所有植被景观，在地质学家看来，它是古生界寒武系至二迭系七个时代的地层。对我来说，这里从内涵到外观是宇宙间大跨度的拼合，我以为，人们对不同地区的生活方式和当地文化、自然、历史、民族、宗教的研究，其最大的意义就是挖掘认识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它是人类丰富自身文明的重要资源。所以，怒江之于我一直并存着两个世界：空间的世界和时间的世界。

在第一个世界里，怒江的自然奇观以奇、雄、秀、险称著，它笼罩在一片深不可测的神秘气氛之中，这是一个由传说和神话构成的超现实的精神世界。而在另一个有时间记载的世界里，它最早的历史是从两汉魏晋时期开始，分属益州郡。到了唐宋时期，高黎贡山一带被封为西岳，还设有节度使。明王朝建立以后，云南广泛推行的是土司制度，怒江也不例外，1384 年，兰坪、碧江等地属白族罗氏土司管辖的丽江府，而泸水、贡山一带分属于云龙土知州和永昌府管辖。

伴随着这源远流长的历史，这里居住着傈僳族、怒族、独龙族、普米族、白族、彝族、纳西族、藏族、汉族、傣族、回族、景颇族等 12 种民族。

据历史记载，19 世纪初叶，西藏察隅县的米空喇嘛从维西康普土司手中取得了对丙中洛、独龙江的统治权，应该说从这一时候起，奴隶制的雏形开始渐渐形成。它的社会形态与其他的奴隶制方式有所区别的是，怒江地区的奴隶主往往是寺院里的喇嘛，其统治方式是以宗教的手段来实施的。比如，米空喇嘛每年除向这个地区的独龙族、怒族收取“超度费”外，还要他们供应“神翁”到这一地区打猎的口粮。19 世纪末，是怒江奴隶制发展的鼎盛时期，各路土司渐渐从喇嘛手中争得了统治权，于是，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成了奴隶主疯狂的掠夺对象，他们征收钱粮，甚至还



征收鸡、猪、牛、狗税和人的耳朵税和鼻子税等……较为典型的是，由于独龙江一带十多个村寨经常受掠，他们只好躲进深山老林靠打猎为生。我在采访中得知，迄今为止，独龙族人口仅四千人左右，其生存的环境完全依赖于原始的刀耕火种，由于气候方面的因素，他们很难从耕作的土地上获得维持正常生活的粮食，这也是造成独龙族人口锐减的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尽管政府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希望他们迁移到外面的世界，可独龙族依然我行我素地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保持着自己独有的生活状态。为此，直到今天，当地的政府每年都要组织马帮将所需的粮食和日常生活用品驮运进去，以维系那里人们的生存。也许，很多人都有与我相同的疑惑：他们为什么不迁往别的地方而非要固守在那里？尤其是在沿途看见一队又一队的马帮，他们那疲惫的马匹驮着沉重的货物，年复一年地在高山峡谷中穿行。在赶马人中，有幼小的孩子和上了年纪的老爷爷，他们披着塑料雨衣，腰间挂着酒壶，缓缓蠕动在漫漫无头的驮运路上，有的马匹，由于不堪重负，背上的毛已经磨秃，皮肉早已溃烂，可它们仿佛是一群天国之畜默默地前行着。偶尔，空荡荡的深谷会传来一阵阵此起彼伏、断断续续的旋律，那是赶马人在唱：

九条江的神帮我们捞石

七条河的神帮我们取石

雨神帮我们捞石

雪神帮我们取石

把雪水灌进手心

.....

叫他手上的皮像树皮一样脱掉

像芋头一样削掉

像爆米花一样发泡

把他的手变成明晃晃的松明子

麻秆秆



走啊走啊兄弟

.....

歌声苍凉高亢，歌词中有的时候是古老的祭歌，有的时候是情歌，但多半是即兴随口而出的天籁之声。多少年来，他们在来来回回的路上就是这样来来回回地重复着同样的艰辛、同样的寂寞，天地之间，赶马人身上的酒壶已成为他们灵魂的一部分，酒和歌唱是寂寞路上最丰富的馈赠，我想他们此刻的精神状态或许已进入到非现实的另一个空间。在看不到人而听得到声音的山谷中，我的眼前总是晃动着他们灰黄苍茫的背影，在这里，大自然与人仿佛共同构筑了一个神秘的超现实的存在，这种不可知的命运感和纵深感是峡谷独有的，只是任何人都很难解释清楚，它究竟为什么是以这样的形式保留下来的。

怒江大峡谷总面积为 14703 平方公里。它的东与西，其最大横距为 153 公里，南北最大纵距为 320 公里，在自然地理方面，它名副其实地成为山之巅、水之源，是云南省西部重要的边防屏障。其地貌的形成是内外应力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发展过程的反映，而两大板块的结合——断块隆起的山地与断陷沉降的河谷盆地相间分布，怒江断裂系包括怒江主断裂、独龙江大断裂，怒江主断裂长达数千公里。有资料表明，自第四纪以来，由于地壳的相互碰撞，使得高原在内应力的作用下不断抬升，同时，河流也强烈地下切。据说，迄今为止，印度洋板块仍向欧亚板块继续运动，而高原的山脉还在缓缓隆起，所以，峡谷两岸地势陡峭，江河纵横切割，常有冰雪崩塌溶化、泥石流下泻，有许多雄关要口、奇峰异石、飞流瀑布，它地处“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南延部分，与青藏高原有所区别的是，这里江河纵横，除三江外，全州有大小河 59 条。然而，伴随着这些激流险滩，云岭各支脉群峰峥嵘、纵横绵延、威武雄伟，郁郁苍苍的横断山是怒江州地貌的特征，山谷间最大的高差是 4408 米，那坚实博大的气魄构造了闻名于世的高山峡谷奇观。

整个自治州由泸水县、福贡县、兰坪县和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构



成。它北接西藏自治区察隅县，东连迪庆族自治州的德钦县、维西县和大理白族自治州的剑川县、云龙县，在它的南边是保山地区的保山市和腾冲县，西边又与缅甸联邦共和国为邻，国境线长达 449 公里。由于怒江与缅甸北部的毗连较为复杂，历史上两国间一直未定边界，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两国于 1960 年才签定了《中缅边境条约》，并于 1961 年 6 月 4 日将原英帝国主义侵占的片马、古浪、岗房等地归还给中国。

俯视怒江州的地域，从东到西有澜沧江、怒江、独龙江，地势北高南低。由于怒江州为滇西第一大横断山脉，这里层峦叠嶂，连绵不断的山峦囊括了云岭山、碧罗雪山、高黎贡山和但旦力卡山。这庞大的气势形成了澜沧江、碧罗雪山、怒江、高黎贡山、但旦力卡山等“三江四山”的地形，而长达 316 公里的怒江峡谷两岸，平均深度 2000 米，这些江河大山以其陡峭和险峻的地势纵贯全境。有地质部门的资料统计，4000 米以上的山峰多达四十余座，最高峰为高黎贡山的楚鹿腊卡峰，海拔为 4649 米，山顶上终年积雪，长达 3 公里的现代悬冰川，冰舌前沿下伸到海拔 4000 米处。正是这极为特殊的地理环境，怒江峡谷便有了“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立体气候。在山坡及低洼地带，这里的植被、景色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放眼望去，形态各异的奇花异草在山谷间争奇斗艳。据统计，其花卉的种类就有 356 种之多，仅兰花就多达百种以上，是东南亚地区兰花品种最为丰富的产地。与此同时，两岸的森林郁郁葱葱、轰轰烈烈、浩浩荡荡，一直延伸和覆盖了山脉的尽头。在人迹罕至的高海拔区域，生长着具有古生态特征的红豆杉、榧木、楠木、香樟等名贵树种和药材。同时，这里的矿产资源十分丰富，铅、锌、铜、锡是主要金属矿藏，而分布在福贡、泸水、贡山等地的石头以五彩斑斓的色泽勾勒出大自然的瑰丽，其中，汉白玉、羊脂玉、雪里翠、贡翠形成了一道道风景线，它好像是在告诉世人：自然与文化的吻合是一种必然。譬如，自西向东的但旦力卡山，它隆起的断块高达四千米左右，而独龙江河谷的海拔只在 720 米至 1600 米之间，该区域立体气候明显，泥石



流广布，常发生山崩、滑坡，可耕作面积也十分稀少。由此，封闭式的生活方式构成了这里的主要特征，再加上自然灾害的频繁，使得生活在独龙江一带的人们一直保持着原始的共产主义分配制，它的文化形态也表现为万物皆神、神无处不在的殷切希冀中。与现代文明迥然不同的是，人的存在不是宇宙间唯一的主体，它往往隐匿于自然界，透过这一带的神话传说，我发现，沉默寡言矗立于风雨之中的石头是他们精神世界的象征，在他们随口而出的歌谣中，我听到了作为“人之初”的纯净，在他们的灵魂中，这里的一山一石都承接了天地间万物之灵的躁动，它凝聚了漫长岁月的侵蚀，给人一种时空结合的感觉。我由此展开了一系列对生命之源的想象，也许，它有可能不是最早的源头，但它有可能是先驱者到来的痕迹。在这些缤纷的意向中，我同所有的外来者一样感到了深入异地的精髓之难，这些独特的图案和个性究竟是什么呢？我常常忍不住俯身拾起这些形状各异的石头，轻轻地拂去尘迹——

在怒江，有许多传说和神话都与石头有关：在贡山怒族的原始宗教中，岩神被称之为“吉米达”，是集山神、猎神、谷神、雨神、生育神、婚配神、保护神于一身的重要神祇。早在藏传佛教（喇嘛教）和天主教传入之前，岩神崇拜已经有了最初的偶体，这就是石灰岩溶洞里各种各样形态貌似人物、禽兽的钟乳石以及悬崖峭壁上与生命有关的种种形象。从岩神的职能看，以下两点具有象征意义：怒族一向认为树木野草是岩神身上的头发和胡须，不能随意乱动，即便是在从事刀耕火种的原始农耕之前，也要先祭岩神以求得它的默许，因而在朝山节中一项最重要的活动即是接“仙乳”（溶洞中的钟乳石滴下来的泉水）泡籽种，因为只有经过“仙乳”泡过的籽种，才能在来年获得丰收。收获时，最先成熟的谷物也要先贡奉岩神后自己方能享用。怒族人还认为，山上的野兽、飞鸟都是岩神所豢养的牲畜，所以在出猎之前，也要举行祭礼仪式，祭词的大意是：“从开天辟地起，我们就是朋友，从有人类开始，我们就是亲戚，请您把家中的飞禽野兽赐给我们一些吧。”祭后，如发现酒碗里落入蝇、虫、蚊、蝶等物，炒面碗上有类似野兽足迹的印痕，这便是



岩神已经发了慈悲，同意他们出猎。另外，在我的考证中，这种拜物教的形成并非是抽象和虚设的，它往往是以直观形式来呈现它的职能：譬如在著名的石门关对面的“双石雀仙洞”（洞口有一对类似飞鸟的钟乳石溶洞），每年阳历的3月15日，在怒族传统的“鲜花节”朝山活动中，有不少青年夫妇都要来这里向岩神企求儿女，他们一般都要在洞口过夜，以此来获得神赐予的生命。较为直观的是，在甲生附近的怒江两对面，各有两堵汉白玉崖壁，东岸的岩壁造型与男体相似，岩壁中有凸出的岩石，类似勃起的阴茎，而西岸的岩壁造型却酷似女体，岩壁中部显现出类似女阴的岩洞，当地怒族人倘若遇到不孕和难产的情况，则男子需拜江西的岩壁，祭女岩神，而女子则要拜江东的岩壁，祭男岩神，并以此求得平安。现在被称为“仙女洞”的闪当溶洞，是当地一年一度欢庆“鲜花节”的圣地。传说有个叫阿茸的怒族姑娘，她受到蜘蛛拉丝的启示，发明了过江的溜索，这使得隔岸相望的恋人终成眷属，而阿茸自己却遭到一个很有权势的头人逼婚，她宁死不从，遂躲到溶洞里冻饿而死。她死后变成了那里的岩神，她象征着爱的真谛，于是青年男女们为了表达对她的敬意，就用最美的鲜花来纪念她，所以这里每年的鲜花节由她而起，此洞也被称为“仙女洞”。在怒族古老的婚配观念中，青年男女的婚姻都是由岩神安排的，与其他宗教形态有所区别的是，这里所有的神祇都与自然和人性本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它很少表现为压迫和威慑，应该说，它是人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人文现象，其最初的思维模式通常具有直观性和具体性的特点，不管是神山圣湖，还是岁月的枯荣交替，一切在这里都是共存的。这是一群消灭了生死界线而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群落，这些神并没有高高在上的训斥人间的姿态，它们与原始的土地一样，脚下的路一片斑驳，思想无章可循，仿佛深深地浸没于无边如磐的黑夜之中——在有关它们的神话故事里，我所能感受到的是万物共生共荣的生命和呼吸。当然，他们的精神领域、道德观以及所涉及的世界观、经济观、婚姻观、生死观等在我的领悟中也许只是表象的毛皮，有时难免是用自己的文化法则去做不无歧误的解释。尽



管如此，我仍然渴望源于这混沌的渺茫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定位，我想这些神祇是人类精神文化的先史，它们几经辗转流变已融入了江河和群山之中，虽然，它们在今天已退潮于现代文明的边缘角落，但我以为，每个人所秉有的灵魂就是来自这上古之初的无形之物。是的，当峡谷中的风声低低地掠过我的耳际，那低沉的叹息声使我几乎能感到它们是在暗中摸索道路，而这种跌跌撞撞的摸索是以横向的、可触摸的现实的形态充塞于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它完全脱离了所谓形而上的纯观念体系。有趣的是，岩神往往没有高贵之分，有时是人，有时是动物，如丙中洛附近的溶洞，怒语称之为“扒母乃”，意思是“母猪仙洞”，它是因洞外有一形似母猪的钟乳石而得名，也就是说该洞的岩神是只母猪，它同样是怒族的崇拜物之一。除此之外，人们心目中的岩神既依赖于自然，同时又回归于人性，它有喜怒哀乐、有悲欢离合、有七情六欲、有相互厮杀，它意味着原始的拜物教是把自然力人格化，这种人、神、自然共融的初始状态是怒江大峡谷深层的文化底蕴。

一

在怒江，我久久凝神于这片土地上的自然变迁。

一次次地在怒江边上徘徊，看江水中的各种光影——日出时云雾在江面上弥漫着丝丝缕缕的天韵，水有多低，云就有多近。使我感到不解的是，在水流湍急的江中心，竟然会不时冒出一棵扭曲孤单的松树，它孤傲而独立，细细的树干在苍茫的天地间透出焦干剥蚀的古铜色，引领着我的想象天马行空。浮在水面上的山影酷似城堡的浮雕，犹如古老的灵魂复活——只见它童话般地摇曳于碧波之中，在晨光的照耀下婆婆隐现、通体金黄。时至今日，我从未有心把它拍成照片，因为它更像是一种幻境，随着日出的升高，目光所及之处已幻化为一团团光束。此时此刻，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一种审美的眩晕，与之相比，我的心智是如此有限、如此贫乏，平日里自认为的淡泊、理性只不过是平庸和虚无



耗尽后的权宜之计。不知为什么，我的眼睛里不知不觉地涌出了一股激流，这是一种久违了的情怀，因为在此之前，我以为我的心智已变得漠然，不会被任何东西所感动。尤其是90年代以后，各种被武装过的思维模式早已淹没在熙熙攘攘的文化潮流中，我想我早已远离了人的初始和神性。是的，在怒江，我又重新体验到了人本的核心，这邈远高阔的天作之合是很难用照片、用定格的方式来写照它的！

倘若说晨光中的怒江赋予我的是人本主义式的激昂，那么，黄昏迟暮时的怒江便具有了智者的风范，只见水面上的浮光掠影与浓浓的乳白、雪红或浅灰色的云块急速地驶过，它们灿灿然浩浩荡荡带着天地之交的亮点直落天外。忽然，就在我心醉神驰的瞬间，水面已由亮而暗，刚才掠过的一阵辉煌已从容地消逝于万丈之遥。当一切悬浮在水面上的幻影归于平静之后，留下来的依旧是两岸默默驻守的群山。此刻，人声、车马声渐渐断续，轰然作响的水声仿佛只是为了深深地潜入寂静，我想那些已逝者、此在者、来世者，那些操着不同语言有着不同信念的人就深藏在这寂静中，他们使我回望自童年、少年、青年走出来的道路以及路上有过的执着追求和困惑，这时候簇拥而来的记忆片段既不是伤感，也不是眷恋，恍然而过的人物和事件仅仅只是以朦胧山影为背景的显现。坦率地说，在我的青年时代，“自我”是唯一的，尼采的超人哲学、维特根斯坦近乎于残酷的怀疑主义论曾在我的胸中布满了偏狭强悍的壁垒，虽然，我一度游荡于这两者之间，游荡于旷野偏僻的路上试图找到点什么，但这怎么可能呢？因为我的“自我”是如此坚固，它早已高高地凌驾于一切之上，所谓的“大自然”更多的是主观意念脱离客体的折射，它所赋予的思想往往充满了偏激决绝的傲慢，那时候我在一首诗里写道：我常在夜里向人致敬／被安置在雪堆得最高的地方／无缘无故地被风吹着／我的心在远离人群的地方／独自长成一棵无根无底的大树……15年后，怒江的夜以它的宽容祥和使我重新想起了它，使我重新对自己的无根无底进行审视。事实上，我的半世人生所能包容的东西实在是太有限了，在怒江边上，我希望此后的生命历程能从一己之茧中蝶化出来，把

目光由一己转向整体，让自己的旅途尽量成为这片土地上自然变迁和社会变迁的载体，我相信，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更为广阔的博大和怡然自得的境界。

那么，我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注目于这片大地上的所有存在？我不止一次地问自己：是以人类学的眼光？（这里无数的山川河流一方面分割出了与大陆地区的自然界线，形成相对封闭的生存状态；另一方面，由于多种民族的共处，再加上与“南方丝绸之路”的腾冲毗邻，这一地区可以说是一个文化多重交汇的特殊区域。）历史学家的追本溯源？诗人和艺术家的随意涂抹？对我来说，我害怕再局限于任何一种分类法。作为现成的参照，现代文化对自然、社会、人文科学的透视往往是以权衡现实的走向为基础的，所谓的多元化格局也通常是由西方文化指向划分、垄断的变种，譬如，亚细亚文化在“欧洲中心论”的划分中被称之为“次文化”，其结果是极为粗略地勾画了一番东方与西方之间某些表面上的差异。如此一来，使我感到困惑的是，怒江的审美是青睐于“走向世界”的口号？还是把握其内部不同的多种构成，以不卑不亢的独特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我想这两者间的困惑不管是于我还是于怒江自身的发展定位，都将面临着举足轻重的选择——

在一切以经济为杠杆的时代，它是物质的么？我们深入它的内部，是想从中获得什么？

它是一种地理概念？

还是一种有别于汉文化的意识境界？

20世纪以来，现代文明出现了一体化和多极化两大趋势，地球上任何完全与世隔绝的文化都将不复存在，一切边缘的、过去不被纳入主流文化的东西，都因传播媒介的日益发展而一览无遗地袒露在众人面前，在这一背景下，以往的价值体系和知识结构必然要受到新的挑战——

翻开中国传统的历史，总体上是以汉文化为核心的。具体地说，是以中原地区为中心，以儒学、佛道为主流的一种单一模式，几千年来它



一直占有主导地位。历代的史官、学者在史书和奏折中一概把西南视为“南蛮子”，即便被写入正史，也通常以居高临下的口气任意取舍。班固在《汉书·叙传》中写道：“西南外夷，别种殊域。”可想而知，数千年中的西南仅代表一种方向和方位，对它的记载也是语焉不详、模糊和笼统的。在我读过的《怒江州志》（未定本）中，我注意到稍有详细的记载是始自鸦片战争前后，从历史上看，这一时期由于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沿印度洋和太平洋自西向东挺进，先是瓦解了印度，随后又瓜分了东南亚，此时，随着西方列强直入中国腹地，西南地区的地理战略意义才引人注目地凸现出来。据州志记载：1911年，英帝国主义武装侵占了怒江一带的片马、古浪、岗房等地，辛亥革命以后，云南地方政府一方面为了保全领土，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削弱地方土司的统治权利，建立了“怒傈殖边总队”，从此开始行使这一地区的军事权和行政权。他们平息福贡、碧江等地蓄奴主的反抗和叛乱，建立了县治的纪元，加强了边防武装力量，虽说这是因为被动而采取的举措，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怒江地区人文、经济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怒江西岸沿线遭到日军的进犯，沦陷达两年之久……有许多文献颇为生动地记录了怒江当地的民族与外来侵略者血肉相搏的故事，但这也仅仅是记录了近代史上的大事、要事。那么，在此之前呢？我发现，它最早的人文现象几乎是静态的，其精髓是被神话和传说勾勒出来的，它们散落于民间，很少载入“正史”。我想，这恐怕是几千年来的汉文化中心论所产生的空缺。也许正是有了这样一种警惕，所以我笔下的怒江是激情和理性的混合，它的叙述只能算是客体与主体的交错，尽管我不能穿越历史隧道的源头，但我希望自己能兼容并蓄，从心灵中呈现出那片土地上鲜活的气息。

三

在此，我有必要向读者交代一下个体与整体的关系。